

第一篇 城市浅说

一、何为“城”

历史上的城，是由村落——村镇——城发展过来的。古希腊、罗马时期的城，人口大约在 10 万以上，上层人物住在城市中心，下层阶级分布在远离中心的城墙内外。各分散的居民区之间，用矮墙和壕沟分开，形成分散的、隔离的社会生活。工业革命推动了城市的发展。劳动分工更加专业化，促进了城市工业化。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提高，导致了通信和交通的进步。城市结构也随之发生大的变化，大都会地区开始形成。

中国人所理解的城，一般指四周围以城墙，扼守交通要冲，具有防守意义的军事据点。《管子·度地》中说：“内之为城，城外为之郭。”《墨子·七患》中则指出：“或者所以自守也。”中国古代城市是由井田制演变而来。《周礼·小司徒》安排了这样一幅井田制规划的蓝图：大块方整的田地，四

周有矮墙（即开沟启土堆成的小垣）围绕着，与小垣平行，又有纵横交错的阡陌，把田地划为若干大小相等的小方块田地。这样的井田，正是一座城邑的写照。后来人们关于城市规划的思想，正是把都城看成一块大井田，并用井田阡陌式的经纬涂制，把都城划分成若干等面积的方块，并以井田单位“夫”作为用地单位，组合成整个都城的用地规划。

城在中国起源很早。《吕氏春秋》和《淮南子》都记载了“夏鲧作城”的传说。而《吴越春秋》的表述尤其具体。“鲧筑城以卫君，造郭以居人，此城郭之始也”。这表明，古籍上关于夏鲧作城的记载，是以殷商史迹为基础的。因为在此之前，社会的聚落只有土堡村寨，只是到了 1928 年，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发现了殷墟以后，其实物证明，殷墟是商朝后期的建都所在，当时已有了高度发达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中心。城作为文明的象征，早在夏商时代已逐步形成；而都城作为一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以及军事活动的中心，在商末已灿然具备。

通过历史资料我们看到，历史上的城一般都呈方形或长方形，少数呈圆形，其余不规则的城则很少见。而且无论是都城，还是府、县城，都基本一致。不仅如此，历代城的方向性还基本一致，即正北正南。尽管南方一些城市因地势关系而形态并不方正，但也可以看出，这些城池的营建在不得已中尽力求方正。每个城池一般都具有城墙和城壕，环绕城池，起着防御的作用。可以说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，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是由那一重重的墙和一道道的门来构成的。人们无法设想没有城墙和城门的城市，就像无法设想没有屋顶和门窗的房子一样。任何一座真正的城市都必须有城墙和城门，而且这些城墙和城门越是高大越多，则这座城市的地位和规格也就越高，人们也就越承认它是城。

一般的城墙只有一重，城墙的宽度可供人行走，主要是用于士兵守城。但也有些大城市有两道城墙，比如明末袁崇焕重创努尔哈赤的宁远城，就有内城和外城之分。

在周朝，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就对城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：“匠人营国，方九里，旁三门，国中九经九纬，经涂九轨，左祖右社，前朝后市，市朝一夫。”这段论述表达了这样几层含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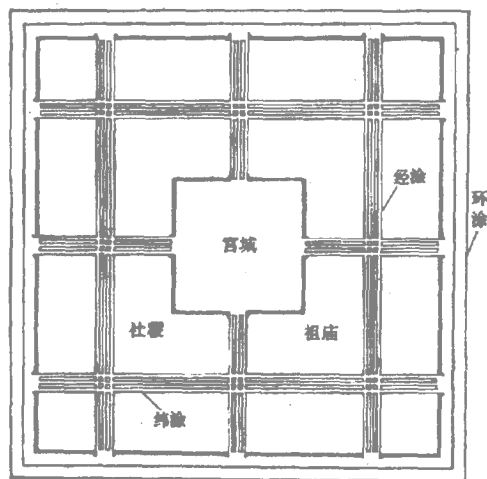
1. 王城作正方形，四周建有城墙，每边长 9 里，各开 3 个城门。

2. 城中有条直街，9 条横街（经即南北干道，纬即东西干道），也可解释为 3 条横街，每街各有 3 条并列的车马大道（轨即车辙，二轨之间宽，周制为八尺，九轨共七丈二尺）。

3. 全城的中央是帝王的宫城，左边是太庙，也就是帝王祭祀祖先的地方；右边是社稷坛，也就是帝王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地方。宫城的前面是朝廷，也就是帝王临朝听政的地方；后面是市场，也就是全城的商业中心。（市与朝各方一百步）

“匠人营国”的上述规划，在结构上具有这样几个特点：

1. “左祖右社，前朝后市”是形成王城规划结构的主要制度。这不仅确立了以宫为主体的中心区，而且更奠定了全盘规划结构的基础，充分体现了王权尊严的规划主题。按照“择国之中而立宫”的要求，将宫布置在全城的中心。环绕这个中心，对称安排左祖右社、前朝后市。以宫的南北中轴线作为全城规划的主轴线，通过主轴线的控制，把象征国家礼制的祖、社统一起来，构成一个以宫城为核心的地区——宫廷区，成为全城规划结构的主体。城的其他各个组成部分，则按照各自功能和规划要求，分别布置在主题周围，聚集而为一个有机整体。在这里，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：尊卑有序，等级森严。



周王城形制，成为中国古代城市的规范样式。其对隋唐以后的都城布局影响很大，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 均是严格遵循这一规制而建。

2. 王城内区的划分清楚，布局严谨。在全城的中心设置宫廷区，在它的北面为商业中心，王室、卿、大夫府等所在的国宅区则靠近王的政治城堡王宫，一般居民闾里则分处于城之四隅。此时的城，已经具有了一国政治、军事和经济中心的性质和作用。而具有这样性质的城，便和一般的城有区别了，称为都。都“就是头”所以到了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成立时，便有了选择、营建都城的重任，都城在全国的地理位置和形势，以及其建制规模，都关系着一代王朝的盛衰。

3. 王城交通网建设，以三条大道为主干，配以与之平行的南北和东西的次干道，加上环城道路，这个道路网是环绕城的中心区对称布置的。中经中纬大道构成了王城的纵横轴线。二者相

交处，即为城市的中心——宫廷区。主干道不仅沟通着城内的各个部分，而且与城外的道路相连，形成一个以王城道路网为中心，遍布千里的庞大交通体系。都城既是政治中心，又可能是经济中心。为了易于统治各地，又便于物资运输，交通道路当然显得尤为重要。有鉴于此，远在周初，就已经开始费力经营，《诗·小雅·大东》篇所说的“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”就是具体的描述。秦始皇所筑的驰道和直道，更为古今所赞誉。这是一项要政，历代都没有稍事放松，因此而构成以王城为中心，向四方辐射的交通网。

20 世纪 50 年代，在郑州发现的商城遗址，就是盘庚迁殷前的商代早期都邑。这座古商城具有相当规模。与之相比，安阳的殷墟则是后期商都，规模更加庞大，宫廷建筑布局水平更高，具有很明确的中轴对称安排。这表明，商人的井田规划比周人的井田规划更加完善。就连以后的燕下都、赵邯郸、齐临淄等战国名城，无不表明与西周王城规划的历史渊源和影响。

城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文化的象征。都城虽同样为城，但又区别于一般的城。不仅古代国家的职能在都城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，而且它还积淀与融通了文化史的成果。以周王朝形成的营国制度为例，它在观念上严格依据礼制，利用方位尊卑布置不同性质的功能分区，把城邑的总体布局纳入礼制的轨道，形成以礼治规划秩序为特色的城邑规划体系。它突出了以“君”为本的主题，以井田制的方格网络系统进行规划，可以安排城邑的形制、道路的布局、闾里的规模，乃至城邑的结构，等等。尤其是参照井田制土地规划所建立的城邑用地规划制度，更加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体系的基础。中国历代都城，除因自然因素的限制，在城市格局上略有变化外，几乎都承袭了营国制度所规定的要求和方法。有趣的是，欧洲中世纪的大城，也多以代表权力的宗教建

筑——教堂为中心，略同于中国的左祖右社，其商业和军事性质完全与中国王城相一致，由此也可以看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共同轨迹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虽然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离不开周公所建的洛邑的典型形式，但这些城与城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。在上古时代的城，主要是王朝国都，诸侯封地、大夫采邑的中心区域。由于这些城的地位不同，所以，《左传》专门对各自城的面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。

二、城市的出现和形成

当一座座由城墙和城门围起来的“城”不断出现的同时，城与乡开始出现分离。尽管如此，二者之间却不可能根本断绝往来。道理很简单，城尽管是一国的政治、军事和文化的中心，但这里并不能生产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，城里人要吃饭穿衣，而且要吃好饭，穿好衣；城外乡间的人们生产了农副产品，自己吃不了，要出售，以换回自己所需要的城里的好东西。这种城里和乡下人，或相同的城里人，相同的乡下人之间的交换场所就是“市”。

“市”一般设在城的边缘，开始时只是临时的场所。因为交易并不是每天都有，或逢年过节，或初一十五。届时，周围十里八乡的农民带着交换的商品赶来，凑集在一起，与城里人进行交换。这就叫“赶集”，是“市”的最初形式。

以后，交换发展成贸易，次数也增多，于是，临时性的“集”就变成了常规性的“市”。其特征表现在：

1. 有了固定的场所。虽然仍在城的边缘，如城南或城北，但已有了低矮的墙垣围住，里面都是商贾工匠，不仅交易，而且

居住。所以，“城”与“市”合为一体，成为区别于“乡”的区域。

2. 在“城”与“市”的关系方面，二者不可同日而论。简单说，“城”住的是王公贵族、高官名士，属于高贵住宅区；“市”为贩夫走卒充斥之地，双方地位悬殊。况且，前者居于市中心，而后者只能勉强在城的边缘安身。

3. “城”里的建筑不是宫廷就是深宅，不可能向平凡人敞开；而“市”里的建筑多为店铺，客观上就注定要开门迎客。甚至搭起凉棚，或在道边摆上散座，以至整条街与建筑连为一体，都成了做买卖的地方。所以，前者封闭，后者开放。

总之，尽管人们习惯于把“城”和“市”连在一块，称为“城市”，可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区别。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，表现得尤为突出。我们说，自古以来都把营建城市作为一件大事，其重视的程度，首先表现在“城”与“市”的布局 and 规划上。这种筹措之完善，几乎细到城池的广狭、街道的宽窄、市区的位置、道路的分布等，无不各有法则，未能相同。

城市的建设既然这么重要，那么，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：选什么地方建城市？

按照古代中国城市的选址传统，注重都邑的脉络形势，是选址的重要标准。何为“脉络形势”？宋代地理大师蔡元定曾经指出：“水则人身之血，火则人身之气，土则人身之肉，石则人身之骨。合水火土石而为地，犹合血气骨肉而为人。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无二理也。”这里强调的，就是“相地如相人”的说法。蔡元定进一步论述到：“大抵地理家察脉，与医家察脉无异。善医者察脉之阴阳而用药；善地理者察脉之浮沉而立穴，其理一也。”

可见，脉络形势是与人体的气血骨肉一样的一种自然存在。

而根据地形、地势特征选择城市的位置，就成为古代风水流派中“形法派”的基本观点。

所谓脉络，主要是指山的走向。唐代堪輿术更将山脉称为龙脉。而“形势”也不过讲的是地形、地势及环境条件。于是古人说：“欲知都会之形势，必先考大輿之脉络。”朱子云：“两山之中必有一水，两水之中必有一山，水分左右，脉由中行，郡邑市镇之水旁拱侧出似反跳，省会京都之水，横本直去如曲尺，……山水依附，犹骨与血，山属阴，水属阳……故都会形势，必半阴半阳，大者统体一太极，则基小者和必各具一太极也。”

北京城自金元明清作为各代都会的选址标准不用说，就是最初在这里作为城市的选址过程中，也都体现了上述原则。古老的蓟城处在永定河渡口的偏北位置，这里是太行山东麓的要道，通向山海关和坝上草原的必经之地，与风水所倡导的宏观地理形势也有某种暗合之处。它后有靠山，前有流水，宽广的大平原形成首都级大城市的宽敞格局。宋代理学大师朱熹，是最早从理论上论证北京可以作为一个全国性大都会的思想的。他指出：“冀都是天地中间好个风水。山脉从云中发来，云中止。高脊处，自脊以西之水，则西流入于龙门、西河。自脊以东之水，则东流入于海。前面一条黄河环绕。右畔是华山，耸立为虎。自华山东来为篙山，是为前案。遂过去为泰山，耸于左是为龙。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，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、四重案。”

从北京城选址这个典型实例中，还可看出古代城市选址的交通方面的考虑，即处于一定区域的中心，为陆路交通的要道。同时，又受河流环抱，能得舟楫之便利。不仅北京，古代许多城市都有这个优势。像浙江金华山的兰溪县，也是一个水陆要冲之地。方志中说：“高山瞰其前，为之眉目，两溪直其后，为之颊辅。水陆冲要，南出闽广，北距吴会，后枕崇冈，前挹九峰。”

这种据水陆要冲的风水之地，在古代军事上具有重要作用。

当然，军事上的作用还不仅需要水陆交通的便利，而且在形势上，最好也能形成天然屏障。风水的典型空间模式，要求后有镇山、左右有砂山护卫，前面有碧水环绕，总之要有防御功能。既然最初的城市，其作用之一就是军事堡垒，所以《周易》中强调的“设险以守其国”的思想就显得特别重要。为此，古代城市除建有城墙之外，还要尽可能选址在固险之处，并以此作为第一道军事防线，而城墙只能算第二道防线。建在天然平地上的城市怎么办呢？那就要选择环抱的水来作天然防线，或在两水分隔处连以城墙。

善医者察脉之阴阳而用药；善风水者，选地须以雄雌交合之地最理想。阳阴交媾必然带来生生不息的生机，雌雄交合也正是这样的含义。长期以来，人们追求风水宝地，实际上就是追求一个有勃勃生机的生息之地。

除城市的选址以外，城市的格局规划也是一件大事。古人在这方面，同样有一番大道理。其核心，就是“天地合一”的宇宙象征理论。“天人合一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，同时，它也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重要理论依据。按照这一理论，人类与所依附的地和头顶的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，因此，三者之间任何一方面的变化，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。人们甚至相信，地上的人类与天上的星星是一一对应的，地上死了一个人，天上就会掉下一颗星星。同样，天上如果掉下一颗星星，那么，地上就会死一个人。

紫微宫是天上北极星周围的一个星座，人们认为它是宇宙的中心。所以，城市的布局也要仿效天象，在城市中心建有紫宸殿或紫禁城，成为天子居住之所。相传，汉代长安城就是模仿北斗七星修建的。据说天界中有八风，排列在八个方面，于是，战国

时候的伍子胥就仿效八风修建了苏州城。城开八道陆门、八道水门，“阳气道万物，阖黄泉也”。所以，该城就以面向西方的闾门为主要的门，称闾阖城。台湾台北市的规划，同样与天人合一思想有关。该城的轴线定位，就是直接以天空中心北极星为标志，东西城墙透视线的消失点指的是东北方向的一座主山峰，以消除东北方向的灾祸。

中国古代城市正是遵循上述原理，进行选址、规划、建设的。尽管如此，新建之城市因地位不同，而在称谓、规模、建置上也明显区分出来。一般说来，大夫的封地称为“邑”，诸侯的封地称为“都”，天子之城称为“京”，表示其绝高的地位。所谓“京”，也就是人工筑起的高丘。难怪国民政府于 1928 年定都南京之际，立即把北京改为北平，表现出“京”的独一无二地位。与此相反，“都”却可以多至数个。“都”就是大城市。“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（也就是大城市。“成都”称谓即源于此）”。

上述关于“邑”、“都”和“京”的传统的城市分类方法，从本质上讲，还属于定性分类。现在，比较科学的方法是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结合起来，据此确定城市的不同类型。

对城市的分类，依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：

1. 按城市的规模分类（主要是指人口规模），可分为特大城市（非农业人口在一百万以上）、大城市（非农业人口为五十至一百万）、中等城市（非农业人口在二十至五十万）、小城市（非农业人口在十万以上）。

2. 按城市的性质分类，也就是按城市在国家或地区中所发挥的政治、经济或文化作用分类，可分为如下几类：

工业城市。即以工业生产为主，工业在城市经济、用地上占较大的比重。按工业构成不同，又可分为综合型工业城市和单一

型工业城市。像哈尔滨，由钢铁、化工、机械制造、轻纺等各种工业组成，所以属于综合型工业城市。而瓷都景德镇、大庆石油城和煤都淮南等，则属于单一型工业城市。

交通港口城市。可分为海港城市，如大连、宁波、湛江等。铁路枢纽城市，如郑州、徐州等，内河港埠城市，如重庆、武汉、芜湖等。

省和地区的中心城市。常为省会、地区行署所在地，并且具有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多种功能。

科学文化城市。这类城市集中了科学文化某一方面的特色。如大学城、科学城、电影城等。如日本的筑波城、美国的好莱坞等。这类城市在中国目前还没有。

风景旅游城市。这类城市一般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条件。

军事城市。这类城市一般位于边境和要塞，对一个国家地区具有重要作用。如原来的旅顺市。

3. 按城市的作用范围分类，可分为：

国际性城市，即影响扩及国际。如作为世界金融贸易中心的香港，国际性港口城市上海等。

全国性城市，在某一方面或多个方面影响全国的城市。如广州、深圳。

地区性城市，即一省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或某一方面的中心，地区一级范围内的发展中心（如烟台、青岛、温州、丹东等）。

上述城市往往在功能或类别上不是单一的。有的海港城市有可能也是省会城市、全国性城市，如广州等。另外，城市的划分标准远不止这些，比如，从城市产生的历史长短，可分为古老城市 and 新兴城市；从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可分为沿海城市、内陆城

市、边陲城市；从城市所处的气候环境，可分为温带城市、热带城市等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城市科学的不断完善，对城市的分类也将日益科学并逐步趋向丰富。

1998年，广州的《新闻刊》举办了评选“最具魅力的城市”和“前途远大的城市”活动。其中，中国最有魅力的城市大体上分为八类：即古都、名邑、圣地、边关、滨城、重镇、商埠和特区。这些城市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安、洛阳、开封、南京、杭州和北京。而这正是著名的六大古都。它们作为千年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，往往是我们民族所建城市的精华所在。这里有太多的遗址可供凭吊，也有太多的线索可供遐想。就连那些民风民俗，也会有一种古老而悠长的韵味。这一独特的文化优势，正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、扩大中外文化交流、开展旅游观光的开发重点，前途远大。当然“前途远大”的城市也有其地理方面的独特优势。在入选城市中，绵阳、张家港、北海、三亚、九江、万县、惠州、绥芬河，或靠江或靠海或靠边境，交通便利，与外界交往机会繁多。这至少标明了一个时代特色：即城市必须在与外界的交往中才能发展。无疑，这是对中国古代围墙成城传统的挑战。

三、“京师”释义

人们把皇帝住的城市称作“京”，叫京师、京都，甚至那里的戏曲也叫京剧。在甲骨文里，“京”就是“高”的意思。京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浓缩。

明朝初年，朱元璋攻下北平（北京）之后，曾向大臣们征求意见，看是否可以在此建都。朱元璋是个很看重风水的人。此时，他的心中早已暗暗地倾向于建都南京。因为南京城的形势在历史上一一直颇受推荐。诸葛亮就曾赞扬道：“钟山龙盘，石头虎

踞此帝王之宅。”北周的庾信在《哀江南赋》中又说：“昔之虎踞龙盘，加以黄旗紫气。”黄旗、紫气，都是喻示帝王之象。而北京城，虽然这里形成原始聚落时主要考虑了地理位置的因素，但当时却没有过多地考虑风水的作用，是个在自然优选的基础上生成的枢纽城市。至于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，恐怕一大半出于大臣们的人为夸耀。蒙古贵族巴图南为了劝忽必烈南下，极力赞誉北京的地势：“幽燕之地，龙蟠虎踞，形势雄伟，南控江淮，北连朔漠。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。”另一位士人陶宗仪也说：北京的宏观形势是“右拥太行，左注沧海，抚中原，正南面，枕居庸，奠朔方。”可见，这都是文人为了封建统治的需要，对北京城风水人为的夸大。

此时的明朝大臣们，已暗暗明白了朱元璋的内心倾向，于是，无不投其所好，贬低北京的风水形势。翰林修撰鲍频及臣僚们就说：胡主起自大漠，立国在燕，及是百年，地气已尽。南京兴王之地，不必改图。

此话肯定正中朱元璋下怀。于是，他不再提建都北平之事，而是全力投入建都南京的筹备当中。他命令刘基相地，精心营建。“作新宫于钟山之阳，在旧城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，故增筑新城，东北尽钟山之趾，延亘周回凡五十余里。规划雄壮，尽据山川胜焉。”

明朝学者杨文敏，对北京、南京是否适合建都的问题，发表了比较中肯的见解：“天下山川形势，雄伟壮丽，可为京都者，莫逾金陵。至今地势宽厚，关塞险固，总扼中原之夷旷者，又莫过燕蓟。虽云长安有崤函之固，洛邑为天下之中，要之帝王都会，为亿万万年太平悠久之基，莫金陵、燕蓟若也。”（顾炎武：《日下旧闻考》引明代《杨文敏集》文）明末学者孙泽进一步论证说：“幽燕自昔称雄，左环沧海，右拥太行，南襟河济，北枕

居庸。……真定以北至于北平，关口不下百十，而居庸、紫荆、山海、喜峰、古北、黄花镇险扼尤著。会通漕运便利，天津又通海运，诚万古帝王之都。（《天府广记》卷一《形胜》）

北京地理位置适中，又有险可守，这也是建都的重要条件。

另外，北京还是明成祖龙兴之地，他已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产生了较深厚的感情，进行了多年的经营。他即便是即位以后，也长期住在北京，而很少住在作为京师的南京。这就出现了历史上常说的所谓“天子守边”的状况。

明代京师移建北京，还出于抵御蒙古的军事需要。因为此时的蒙古势力对明王朝的威胁一直没有解除。为此，必须加强北边防务。这表明，控制和管理东北和西北的大片疆土，建都北京比建都南京更为有利，符合中华民族长期融合发展的政治需要。

于是，明成祖在靖难之役取得皇位后，臣僚们知道他有意留在他的封地——北京建都时，就又奏疏迎合称：“伏惟北京，圣上龙兴之地，北枕居庸，西峙太行，东连山海，俯视中原，沃野千里，山川形势，足以控制四夷，制天下，成帝王万世之都也。”到了万历年间，编修《顺天府志》时也肯定了北京作为首都的“形势”：“兹环沧海以为地，拥太行以为险，枕居庸而居中以制外，襟河济而举重以驭轻，东可贡道来万国之朝宗，西北诸关壮九边之难堞，万年强御，百世治安。”

以后的历史发展多次证明了明成祖迁都北京的正确性。如明朝正统年间发生了“土木之变”，英宗亲征被俘，但北京仍岿然屹立，终使南侵的也先北归。嘉靖年间发生了“庚戌之变”，俺答直通北京城下，但终未能将北京攻陷，只得退回。显然，这都与明成祖把北京营建成的固若金汤之势分不开。正因为如此，不仅由明到清，而且直到今天，北京一直是中国的首都，明成祖的这一历史功绩不可磨灭。

按照后人的研究，作为一国或一朝的京师，至少在自然环境和军事、经济，以及社会基础几方面，应该具有优势。

首先是自然环境。京师的设置因素中，自然环境占据首位。因为，如果忽略了自然环境，那么，关于京都的所有设想，就都丧失了存在的基础。这里说的自然环境，包括地势、山川、土壤、气候、物产等方面。如何看待自然环境？这在历史上曾存在过不同的标准。早期，人们觉得京师所在之地应在河的上游，以利于统治全国。因为关中地势显得高亢，按照东低西高的地势来看，关中自然形成居高临下的形势。北京也符合这一要求：“地处雄要，北依山险，南压区夏，若坐堂隍，俯视庭宇。”（《金史·梁襄传》）

与关中和北京比起来，中原各地都城显然缺少这一优势。中原各地地势皆较低，多为平原，也就谈不上居高临下。难怪宋太祖并不满足于在开封建都，而是打算迁都洛阳，再由洛阳迁长安，借此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升，以示他们居高临下的态势。至于在江南建都，由于位于长江下中游，更谈不上居高临下了。相反，这倒会形成被临的地方了。

山川是古人选址京师时也很重视的一个问题。洛阳的南北有山，中间有河，伊、洛之阳还有个广阔的原野，可以从容周旋。有鉴于此，周武王灭商之后，才选择洛阳作为雄邑，也就是周朝的东都。应该说，相当多的都城都是与山有密切关系的。道理很显然，山可以作为防守的凭借。在这方面，长安可称为典范。它的南侧是南山，也就是后来的秦岭，西侧有陇山，北面有岐山、九峻、嵯峨山，东侧虽无山，但黄河更可算是天然的沟壑障碍。长安周围自西到东，相互呼应，成为屏障。所以，长安又有“四塞之固”的赞誉。

北京没有长安城“四塞之固”的天然屏障，只在西北有太行

山和军都山，东北有燕山，蜿蜒曲折，连成一线。而在东面，则是毫无遮掩的一片大平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北京城只能建在高山屏障的附近了。

提出京师靠近江河，其作用主要有三：一是便于交通，二是灌溉农田，三是军事防御。

北宋的京师开封与南宋的京师杭州，在交通方面可算是得益于江河最多的。开封附近多河，而且都是人工开凿的运河，如汴河、蔡河、五丈河等，开封正是这几条河流的交汇处。而杭州呢，滨钱塘江北岸，隔过去还有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，成为水上交通的枢纽。洛阳府附近伊、洛、瀍、涧四水，也是能行舟楫之地。长安，素有“长安八水”之称。这八水皆能灌溉，其中的渭水更能通行航运。在南京城，水在军事上的作用尤为突出。南京作为都城，自古就是凭借长江天险，以防御来自北方民族的进攻。当然，这也是交通运输的便利条件。南京城旁的秦淮河不仅有漕运之利，更使南京城的风光愈加绚丽。

北京附近也有永定河、潮白河和温榆河，以及高粱河。北京于元时新凿的运河由直沽向北，由通州西折，而达于大都城下。

其次，看经济方面。经济是基础。经济因素是不能稍有或缺的因素。一些王朝建立伊始，也许不用过多地考虑文化建设等问题，然而却必须立刻解决军需民用的粮食问题。

京师为人口聚居之地，生活物质的供给十分重要。最好的办法自然是在京师附近就地解决。就像今天，许多大城市郊区有粮食生产基地、副食品生产基地一样。尤其是在交通运输能力较差的古代，于京师较远的地区输送生活物资到京师，当是一件较难之事。

因此，就必须选择附近地区相当开阔之处建城，尽管这与军事上的险要要求相悖。因为只有地势平坦广阔，才适于生产和谋

取生活物资。这也正是周朝经营洛阳的重要原因。甚至直到唐朝，之所以选择洛阳为陪都，也与粮食的供给紧密相关。

手工业的发展也是都城经济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。只有这样，才可能供给京师以除农业产品之外的生活必需品，如生产工具等。当然，一个都市在经济诸因素中面面俱到也是不现实的。拿手工业来说，冶铁业就需要矿石。这在平原为主的地区就不易解决。因此，必要的外供仍然很重要，尤其是在粮食方面。从遥远的地区运输粮食，供应京师的需要，而且还要长期不间断，这的确不是件容易事。为此，一些王朝往往采取迁就富庶的粮食产地的方法。而那些本来就建在长江下游的都城，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。但这一优势也会带来相反的结果。历史上的南宋建都杭州后，就部分因为当地的富庶而削弱了气势，再难以渡过长江去复仇了。

翻开历代京师所在城市的分布图可见，一些有名的都城大多位于燕山之南和陇坻之东，也就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，以及稍南稍北的地区。这恐怕与这一地区的气候温差不大有关。温和的气候可以带来丰厚的物产。像关中，被称为“九州膏腴之地”，不仅有玉石、金、银、铜、铁、豫章、檀柘等异类之物，又有稻、梨、栗、桑、麻、竹箭之饶。东汉时期的邺都，不仅富产梨、栗、耐酒和笋、枣、果、稻，还有锦绣、绵行、缣总等，可算是纺织业的中心。北京于战国时为燕国的蓟。主要物产有鱼、盐、枣、栗。唐代的幽州，其产的栗更成为贡品。这些丰富的物产，当然是京城形成当中的重要经济因素。

再次看军事方面。军事防守是形成都城的一个必要因素。京城当然应该处于具有一定险要的地方，作为防守的凭借。不仅如此，它还应当具有指挥全局的条件。像洛阳，因为位于“天下之中”，通达四方的路程相近，当然有利于全面指挥。另外，像开